

杜佑评传

郭
锋
著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通典

第十一
張

權

算經

句之

學所冀迪興實不

夫夫理道之

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

人曰財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

禮節衣食

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

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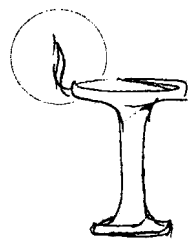
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

番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

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

元哲王政治之天方也故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杜佑评传

郭锋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佑评传/郭锋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5942 - 1

I. 杜… II. 郭… III. 杜佑(735 ~ 812) — 评传
IV. K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5528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杜佑评传

郭 锋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 rulin. com. 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28 字数 303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942 - 1

定价: 56. 00 元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 亚 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

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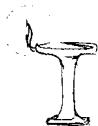


“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



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内 容 简 介

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代表作《通典》一书体制宏大、思想深刻,总结过去,反映现实,开辟历史编纂学新途径,在中国古代的国家行政理论、政治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本书紧扣唐中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时代背景,细致考察、介绍了杜佑一生的经历,他的近六十年的从政生涯和著述生活,在此基础上,对杜佑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成就及其贡献,做了比较详细的讨论阐述。全书有新视角,资料丰富,考证深入,分析透彻,读起来引人入胜,反映了杜佑研究的新水平。

A Brief Introduction

As a famous politician, scholar, and theorist of the Tang Dynasty, Du You made an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the study field of the state system and administrative rule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in the ancient China up to his time, with his important, valued, and pioneer academic works of Tong-Dian.

This book gave a detail investiga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Du You's political life and academic works. And based on this, the writer discussed and explained carefully the Du You's political thought, economical thought, social thought, and the academic value and meanings of his works.

The plentiful materials, penetrating analysis, and the new angle of view make the book a beneficial book to today's Du You Study, and to the readers as well.

前 言

唐朝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唐初到唐中叶,亦即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的百数十年间,中国社会制度完备、生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一片和平景象。文明的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唐人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创造的盛唐文化,是当时领先时代、代表世界文化发展水平的先进文化。唐朝这300年,也是我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开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经历安史之乱战争打击之后的中国社会,在唐中叶到唐末百数十年的时间里,藩镇割据战争不断,和平景象不再,盛世成为过去,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都开始发生变化。社会面临变革。中国历史进入前期封建社会向后期封建社会转变发展的时期。

唐中叶到唐末百数十年的社会发展特点,用“转变”、“变化”这样的关键词来形容描述最为贴切。这一时期,从政治的角度看,以皇帝制、三省六部制、郡县制,以及适应其制度的儒家思想指导的礼法律令体系为主体的、秦汉以来发展起来的

国家制度和政治思想体系,在经历了唐前期具有定型总结意义的实践发展之后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不仅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例如地方行政方面,道—州府—县的三级制行政体制,就正在逐渐取代以前的郡或州府—县两级制体制,成为唐后期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形式。中央、地方的行政办事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开元天宝时起较多运用的相当于今天专事专管专办“委员会制”的使职差遣的办事方式,这时运用的场合更为广泛了,安排专使办事的范围涉及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各种事务,使职的作用越来越大。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形成对原本主管相应事务的正式职能机构的冲击,唐前期建立的正常行政秩序现在开始变化了。分权分治的思想这时也更加发展,并在藩镇政治的地方治理实践中得到体现。形成对一贯强调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的儒家传统治国思想的冲击。

社会的阶层划分、尊卑贵贱评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做官的机会向所有人开放,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的加强,个人能力取向的“尚官”观念正在逐渐取代门阀士族家世取向的“尚姓”观念,成为指导社会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的主流观念。

从经济的角度说,以均田租庸调制走向崩溃、两税法新的税制产生为标志,社会的经济生活,包括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和占有形式、国家与社会生产者之间的财富分配方式,也开始进入了以土地私人占有制和征收资产税财富分配方式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时期。社会的经济生活面貌也在发生变化。北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受藩镇割据影响走向凋敝。与此同时,南方社会的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历史发展机遇期。人口



大规模南迁,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南方社会的城市生活、商品货币经济也较前更为发展了。这一时期,由于藩镇势力的存在,对唐统治者来说,如何取财用财,满足日益增长的国用和军费需要,一直是最重要的、也是越来越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是人心不安、思想波动、各种社会思潮涌动,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挑战、经受考验的时期。儒家、道家、佛教等各种思想文化流派都有广泛的人群基础。儒家的思想体系,儒家倡导的价值观念,仍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仍是城市、乡村社会各阶层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指南。与此同时,佛、道的思想、知识、信仰、价值观念,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也日益增长。总的看,受安史之乱八年战争打击的影响,生活在唐中后期的四五代人,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体现在诸如“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论、“科举”与“府辟”之争论,以及“救弊”之议、“春秋”之学、“心性”之辩、复兴儒学道统的“古文运动”等社会思潮、学术讨论、文化运动背后的,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危机。指向以后宋明理学的新的思想体系、思想方法,正在生长形成之中。

本书的传主杜佑,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国历史上很有成就、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杜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面临变革的历史条件下读书、做官、著述、生活,“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①,关注现实人生,关心社会问题,开展他的政治、学术和思想活动的。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杜佑在唐朝历史上保持着三个纪录,似乎没有人能够打破。一是18岁入仕,78岁退休,当官近60年,从政的时间最长。

杜佑出身于一个有着显贵门第的士族官僚家庭。在开元天宝昌盛和平的环境中度过青少年时代并初涉政治,在战后唐王朝的国家重建困难重重、整个社会面临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历练发展,进入高层官员行列,先后参与过淮南、江西、岭南等地的地方秩序重建,朝廷的漕运整顿、税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应对永贞革新,以及元和初年的平定藩镇准备工作等重大政治、经济活动,18岁门荫入仕做一个基层小吏,78岁以国之宰相身份退休,当官从政的时间长达近60年,这在唐朝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杜佑保持的第二项纪录是《通典》一书的写作,从开始动笔到最后完成用了36年的时间,写一部书用去的时间最长。这个纪录,是当时乃至后世很少有人能够打破的。开元时人张守节写一部《史记正义》,用了30多年的时间,比起杜佑来要短一些。可以说杜佑的一生,除了做官处理政务,有一大半的时间就放在《通典》的写作和修改上了。当然,《通典》一书的博大精深、规模恢弘,仅从篇幅上看就有200卷,近150万字,也是耗费时日如此之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项纪录是69岁才入朝为相,做宰相时的年龄最大。唐朝定制,官吏70岁致仕退休。杜佑到了快退休的年龄才当宰相,而且一当就是近十年,这种经历,在唐朝的历史上似乎也是绝无仅有的。杜佑有如此境遇,是因为在为相的头几年里,从德宗、顺宗到宪宗,皇帝三易其人,特殊的权力过渡政治局势所致。

